

1990年以来中国—新加坡民间关系的发展*

——以中国新移民与当地华人社会的互动为例

吴前进

摘要：中国与新加坡建交以来，两国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日趋频繁，特别是近30万中国新移民为这种互动奠定了彼此交往的民间基础。中国新移民与新加坡华人的社会互动，说明了国家关系与民间关系互为依存，民间关系在由弱向强的转化过程中，促动了国家关系的发展。中、新两国民间交流有必要率先透过不断磨合与各种渠道，逐渐走向融汇与亲和，以国家关系发展来体现民间交流的价值，中国新移民对于民间关系和国家关系的意义和功用，不可低估。

关键词：中国新移民；新加坡华人；社会互动；民间关系

中图分类号：D73/77.38；D8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6)10-0083-09

作者简介：吴前进，上海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200020）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全面改善、恢复和发展。此后，通过各种途径到东南亚各国留学、工作、经商和探亲的中国大陆人士日渐增多。1990年，中新建交后，新加坡政府正式接纳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两国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日趋频密。由于华族构成新加坡社会结构的主要成分^①，故本研究以中国大陆新移民与当地华人的社会互动为线索，探讨在国家关系建构前提下，两国民间关系的基本内容及其对国家关系的相互作用。其中，移民的角色和功用，作为一个自变量，呈现着民间关系的基本趋向。本文以此为视点，探讨新移民在新加坡社会发展中的作为和意义。

一、新移民社会资本的积累和运用

众所周知，新加坡是一个以人才立国为基本方针的国家，它欢迎华人和非华人精英移民进入该国。1989年，政府曾提供25,000个配额给有技术的香港专业人士和他们的家庭移居新加坡。这项政策被视为与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有关。至于公开接纳中国大陆移民是1990年之后。李光耀强调，“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人，我决定吸收聪明的中国人才到新加坡工作和学习，以便他们了解新加坡人，并成为新加坡的一分子”^②。这样，从接纳在欧美受过教育的研究人员开始，逐步扩大到音乐家、书法家、画家、运动员、播音员、演艺人员、留学生、技术研修人员等在内的各种专门人才。他们聚集到新加坡，奠定并促动着两国民间往来与交流的日趋开展。此中，一些人在短期工作、学习之后回到中国或前往第三国，另有一些人留了下来，成为当地的“中国新移

收稿日期：2006-08-24

* 本研究受“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

① 目前，新加坡400多万人口中，主要有华族（76.8%）、马来族（13.9%）、印度族（7.9%）和其他一些较小的族群（1.4%）。

② 杨建伟：《新移民的作用与价值——读李光耀国大“资政论坛”讲演有感》，[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10月24日。

民”(new Chinese Immigrants)。“中国新移民”是指“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 前往国外并取得当地居住权或居住国国籍的华侨和华人”^①。其移民方式主要有专业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留学生移民、家庭团聚移民和非法移民等。本文关涉对象为各类合法的中国大陆新移民, 不包括非法移民^②和短期合同劳工^③。如今, 这一新移民群体已有 30 余万人, 占新加坡总人口的近 10%^④。他们正努力寻求和积累社会资本, 实践个人奋斗。

1. 透过社会资本的获取和积累, 融入社会, 反馈人群。“社会资本”, 按英语词义理解, 社会的 (social), 指互动与结交; 资本 (capital), 指可以使用到的资源^⑤。二者合成延伸为, 经由公民彼此互动而形成的可以调动或享用到的资源。简言之, “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属于一种“可以通过个人直接或间接关系而获致的资源”, 它与社会网络的概念密不可分^⑥。当社会资本概念运用于移民研究领域时, 移民的“社会资本”, 指的是“移民个人通过其社会网络和更为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身份而获得的调动稀缺资源的能力”^⑦。其伸展范围从非正式团体到高度组织化的机构, 包括家庭、邻里关系、组织、志愿团体、运动者俱乐部、自助团体、家长—教师联合会、信仰团体和竞选集团, 以及通过技术而构成的“虚拟”环境。所有这些关系领域都构成社会资本的基本要素, 其基础在于成员间相互信任。换言之, 社会资本是建立在共同信仰、规范和价值基础之上的^⑧。中国新移民抵达新加坡后, 面临的是社会关系的重组与培植, 他们依靠的对象首先是族群内部关系, 如熟人、亲戚、朋友、同事、同乡和宗亲会馆, 这些关系不仅有助于他们寻找工作和安顿住所, 更有益于他们身心健康和排除孤寂, 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起到安定与稳定的作用。在此过程中, 共同的种族身份、文化背景, 成为相互信任的基础和互酬行为的前提。如, 表现在寻求工作者和提供帮助者之间, 前者得到帮助, 后者赢得友情和尊敬——彼此互为社会资本, 以达成团体内部团结与和谐。许多初到异地的新移民都有类似体会和经验, 即通过与社会成员和相关团体的互动, 有助于迅速建立和培植适合个人生存与发展的关系网络, 以便在新环境中实现个人价值和奋斗目标。以新加坡较为成功的地产新秀王泉成为例, 其事业起步与发展, 得益于社会资本的有效积累、运用和拓展。

20 世纪 80 年代初, 中学毕业的王泉成有了到新加坡打工机会。当时他只是建筑工地小工, 每日过简朴日子, 干繁琐体力活。但经过一段时期努力工作后, 他受到了重用, 职位升迁, 有了积蓄。这时, 广交朋友的他得到了来自朋友的一个重要信息: 一项政府工程正在招标。于是缺乏资金的他鼓动亲戚一起合伙注册了公司, 并且使公司中标, 开始了人生第一次创业 (评注: 社会资本的正效应: 朋友的信息、亲戚的合作, 奠定事业的起步)。

但接下来, 他的公司里塞满了亲戚的家人, 王泉成被架空了, 他第一次了解到亲情在利益面

① “新移民”不属法律概念, 是借用国际通用说法。根据中国法律: “华侨是指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对“定居”解释是: 已取得居住国居留权为定居。以此而言, 凡取得居住国居留权的各类新移民, 为华侨; 加入居住国国籍者, 为外籍华人。

② 新加坡法律对非法移民和非法移民雇主都规定了严厉的刑罚和体罚。

③ 有关“合同劳工”是不是移民的问题, 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 劳工不是移民, 他们在合同期满后, 必须回国, 这是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但历史和现实显示, 在一些国家, 合同劳工成为以后的移民, 劳工移民并不鲜见。但是在新加坡, 由于政府政策的严格限定, 劳工要成为移民, 可能性非常低。故本文暂且不把短期合同劳工纳入研究之列, 尽管他们对于新加坡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④ [日] 小木裕文: 《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 厦门大学《南洋资料译丛》2003 年第 1 期, 第 22-28 页。

⑤ “Foundations and Social Capital.” ECOTEC Research and Consulting Limited. A Final Report to the Network of European Foundations for Innovative Co-operation (NEF), Produced September 2001 (last updated March 2002).

⑥ 罗家德、赵延东: 《社会资本的层次及其测量方法》, 李培林主编《社会学: 理论与经验》第 1 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102 页。

⑦ 王奋宇、赵延东: 《理论与研究综述》, 中国网 2003 年 6 月 20 日。

⑧ Ibid.

前不堪一击。王泉成撤退了，单独组建了“连泉建筑私人有限公司”。作为企业人的王泉成诞生了（评注：社会资本的负效应：排斥他人，强调同质团体的捆绑利益）。

此后，王泉成名气越做越响，成了最快富起来的新移民。其公司业务范围不断拓展，从建筑业到酒店业、旅游业，中国内地也成了他主要投资方向，……没有人知道王泉成经营详情，他自己曾自得地说：新加坡建筑公司有百来家，还活着的有 50 多家，活跃的有 10 来家，不负债的能有几家呢？我是其中之一（评注：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相得益彰）。

如今，王泉成进入了富豪阶层。他倡导成立了新加坡华人新移民组织“华源会”。他坦言建立这个组织的目的在于：“改变世界对华人的印象。”同时，他希望他的同胞能尽快融入居住国这个多族社会，得到应得的回报^①（评注：社会资本的积累、拓展与反馈）。

此番成功景象在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社会里，不属普遍现象，却是极典型的个案。它形象地显示了新移民如何凭借努力和智慧，有意识地通过个人关系网络，实现社会资本的积累、运用和拓展的过程，从而有益于人群、社会和国家。

2. 透过社会资本的运用和拓展，架构网络，促进交流。与传统移民不同，当今跨国华人或华人精英移民，在异地追求的，与其说是生存与发展，毋宁说是雄心的进一步施展。他们游走于世界各地，随时选择不同的去向，以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正因此，凭借拥有多种知识背景和能力，这一批人具有不断超越自我的勇气，故其社会资本的运用和拓展，在于更广泛的社会承认和更理想的社会地位。他们在穿梭作用于居住国、祖（籍）国和第三国的同时，正在把个人价值、族群关怀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这方面，华人学者刘宏可以视为一个典型^②。

刘宏（Liu Hong），1962 年生于中国福建。1982 年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获文学士学位。1985 年获复旦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在厦门大学历史系任教。后远赴美国，于 1995 年考获俄亥俄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底应聘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2000 年 8 月被授予终身教职（tenure）。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研究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历史系以及斯德哥尔摩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等机构从事研究和讲学工作。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暨社会科学院副教授，从事有关海外华人问题的教学与研究。同时，他亦被聘为北京大学和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以及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和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兼职教授。亦被北京大学聘为历史系博士生校外考委。曾以中、英、荷文在欧美、中港台、日本及东南亚发表学术论文 70 多篇。

这幅“跨国华人”图谱描绘的是：一个随时在世界各地游走，拥有广阔知识背景和能力，曾为多个重要学术机构工作，且身兼数职，乐此不疲的人。当他停靠、栖息在新加坡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的下一站会是哪里。按照刘宏自己给出的“跨国华人”定义，指的是：在跨国活动过程中，将移居地同出生地联系起来、具有多重关系和背景的移民个人和群体。其特征被归纳为：具有两种以上语言能力，在两个或多个国家拥有关系网络和事业基础，且具有行动上的跨界性、文化上的掺杂性、经济上的全球性、社会上的互动性和认同上的多元性等一系列共同内容。除此之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选择了不同于传统的“落叶归根”和“落地生根”的生存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既在此处又在别处”的游移常态。他们属于“华人世界主义”新身份的一群，而不特别固定在某一处。与此类似，刘宏也时常在游走于两地乃至多国的同时，把自己的知识、能力，贡献、反馈给居住国和祖（籍）国，在自身领域内促进和推动“这儿”（新加坡）与“那儿”（中国）之间的知识连接、交流和共享。在这种循环中，一种更适合于当代跨国华人的发展模式

① 《新加坡地产新秀王泉成》，行业信息在线 <http://www.022.net.cn> 2005 年 11 月 6 日。

② 在有关“新加坡中国新移民”的各种报道中，无一例外均突出了刘宏作为新移民或跨国华人的成功例子。参见北京《了望东方周刊》，2005 年 5 月 11 日；上海《新民周刊》2004 年 11 月第 8 期，第 18—23 页。

呈现：个人的“行为—关系”被嵌入到连接全球各地的知识网络中。在此框架内，社会资本得以增殖，社会网络不断拓展，人群、社会、国家乃至地区之间的各种关系经过各种有意识的人为架构而实现了旨在促进相关利益共同发展的互动。在此过程中，跨国移民对民族国家的关系在更新。

综上所述，新移民社会资本获得、积累、运用和拓展的过程，是一个移民如何通过个人努力，实现社会融入、体现个人价值的过程。在这里，社会资本的工具性意义和资源性功效，已为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移民个人所认识和掌握，即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的正相关意义，提示越来越多的新移民在融入新加坡社会的同时，努力把居住国和外部世界联系起来，展示当代移民对于民族国家的世界性意义。王泉成和刘宏的例子，无论是从企业家角度，还是从学者身份来看，都明确地显示了新移民的价值选择和功用取向。

二、新移民与当地华人的社会互动

社会互动，指人与人之间、群体之间通过接近、接触等方式所发生的交互作用过程。它一般包含：(1) 接近和接触阶段，(2) 理解与了解阶段，(3) 调整与反应阶段。有时，也指两种不同社会文化体系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影响社会互动的因素有很多，但主要为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因素。以此观之，在1990—2006年的16年间，中国新移民与新加坡华人在经历了起初的接近和接触阶段之后，逐步开始了相互理解和了解阶段，进而实现了彼此之间的关系调整，进入了民间关系发展的新阶段。当然，在这种关系演变中，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以及在区域经济中的突出地位，从根本上为海外的中国新移民与居住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互动奠定了自信、自强的实力基础。

1. 社会互动的消极阶段：近亲憎恶感。中国新移民和新加坡华人之间，有着共同血缘，表面看来，相互间交往应不成问题。但现实是，由于长期疏离和隔膜，以及政治体制、教育背景、社会习惯和文化价值观的不同，双方不时发生摩擦，甚至出现同一民族才会有的近亲憎恶感^①。一些受过西方教育的年轻华人认为，中国新移民贫穷、落后，专门在当地从事不正当行业，不择手段赚钱。而一些新移民本身的不良行为又加深了这种歧视和偏见。双方普通民众之间鲜有文化身份上的认同感和亲切感。一些中国新移民对新加坡的评价则是：现实与理想相差悬殊，新加坡不如过去想象的那样好，特别是面对一些当地年轻人的傲慢、排斥时，他们在感觉上尤为不快。此外，一些企业在用工上歧视中国新移民的现象，也比较普遍^②。正所谓，怀着希望而来，带着失望而归。2001年，旅居新加坡多年后返回中国的女作家九丹把个人生活感悟写成小说《乌鸦》发表后^③，引发了新加坡华人和当地媒体的种种议论和评价。外界就此认为，它折射出两国民间关系所存在的微妙而复杂的情怀。

尽管民众的负面评价超过正面印象，但还是有一些清醒的华人中肯地希望抛弃种种不健康心态，呼吁道：“朋友们，读了《乌鸦》，让我们别情绪失控，更千万别因此而伤了新、中两地的友谊。”^④并指出：“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角落都有好人与坏人，新加坡也不例外。我所认识的来自中国的朋友们，有建筑劳工，有电子厂技术人员，有大学研究生，有商界博士，也有嫁来这里的善良邻居。我们都能愉快交往，保持人类应有的友谊。”^⑤睿智的新加坡华人对于移民和国家关

① [日] 小木裕文：《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厦门大学《南洋资料译丛》，2003年第1期，第22—28页。

② 《新加坡：未必很理想》，上海热线2001年2月28日。

③ 《乌鸦》描写的是一群怀着绿卡之梦的中国女人留学新加坡的故事。与其他讲述中国人在异国他乡历尽艰辛而终获成功的类型化小说不同，作者九丹塑造了一批大陆女性为了在异国生存并长期居留，不择手段、相互倾轧，甚至不惜出卖肉体，但最终除了身心俱疲、伤痕累累之外，仍然是一群漂泊的女人。小说出版后，在新加坡华人社会中反响激烈。

④⑤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6月27日。

系给出了清晰的理解和判断，他们的确看到了身边许多优秀的中国新移民在努力工作。只是这种评价和认知，还没有在新加坡民众间形成共识。因为历史的原因，新加坡华人社会内部存在着华文教育和受英文教育的两个群体，他们在文化价值和身份认同等多个领域里有不同看法和矛盾。受华文教育的老一辈，力图保存华人文化的“根”源，对中国文化和传统有特殊感情；而受英语教育为主的年轻一代，对中华文化淡漠、排斥，不愿意认同与中国有关的一切^①。然而，中国经济的发展，令当地政府和民间均认识到，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强国的挑战；他们必须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人。事实上，过去的16年间，中国新移民已对新加坡社会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影响。

2. 社会互动的转折阶段：文化的影响。语言是族群边界标识中最常见的个人认同的象征符号。随着中国新移民的到来，华语、华文的运用范围在新加坡逐渐扩大。在新加坡国立大学，10多年前校园里很少能听到华语的声音，但如今华语的使用在学术精英层面率先得以复活（当然，教学用语和行政用语仍然为英语）。该校东亚研究所的研究人员90%为中国籍人士，中文系教师80%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这在以英语为主的新加坡社会里，成为一个突出的新现象。在华文媒体方面，受众层面逐渐增加。由于英语教育的渗透，以往华文报纸订阅数一直比较少，但近年来随着中国新移民流入和中国留学生增加，报纸销量显著增加，至2002年发行量已上升到46万份（英文报纸为102万份）^②。此外，在电视广播方面，TCS8频道和UHF的华语广播视听者也在增加，播音员、主持人均来自中国大陆，很受欢迎^③。在公共场合，华语华文影响继续扩展。近30万中国新移民的流入和中国观光客人的增加，给新加坡的语言景观带来了改观，在历史博物馆、美术馆、玛岭花园等，除了英语说明之外，都附加了华语说明文，在牛车水（唐人街）地区还设置了同时写有华语和英语的路标。2001年，第一本华文版《新加坡街道指南》出版，所有道路、建筑物、公园、住宅区、学校、岛屿、河流、湖泊等都附有华语名称，大大便利了来自中国大陆和受过华语教育的老一辈华人。此外，华文书籍的出版和消费开始增加，新移民设立了出版社，经营华文书店^④。华语华文的社会影响在新加坡日渐扩展。李显龙总理在为2005年度推广华语的开幕仪式上强调，华族新加坡人学习和讲华语，不单为了经济上的理由，更兼具文化上的理由。它能使我们保持认同感和文化的根，让我们开启有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宝库^⑤。提升华语、华文水平，已成为政府对民众的要求。

3. 社会互动的积极阶段：接纳和欣赏。中新建交只有16年，但中国新移民已经在新加坡的科学、技术、商业、宣传媒体、音乐、演剧、美术、书法、体育等领域发挥着独特的影响和作用。仅以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来说，两校都有许多来自中国的研究员。在南大教学和研究人员中，中国新移民占了颇大的比例，尤其是一些工程和科研的研究领域，中国新移民的比例更大。对此，新加坡前任华裔馆馆长纪宝坤教授在评价新移民作用时指出，中国新移民可壮大本地大学的科研阵容，对知识经济作出贡献。他们也能对本地文化和华社组织产生影响，使华族方言群多元化，并使华文和华语的应用范围扩大^⑥。近年来活跃在亚洲地区运动会上的新加坡运动员

① 《曾玲博士“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现状与研究思考”专题讲座纪要》，北京《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1年12月第4期，第79—80页。

②③④ 新加坡中文报纸有《联合早报》、《新明报》、《联合晚报》3份，均在新加坡报业控股公司的经营管理之下。《联合早报》由原来《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按照政府指导）合并而成。1990年新加坡与中国建交后，《联合早报》为了减少华语书面语与中国汉语书面语之间的背离，从中国招聘了几名编辑从事校正和审核，现已有包括记者和驻外人员在内的30多名中国籍人士在职。[日]小木裕文：《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厦门大学《南洋资料译丛》，2003年第1期，第22—28页。

⑤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5年11月16日。

⑥ 《中国新移民能对知识经济作出贡献》，[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7月30日。

有许多是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在学校的华语辩论大会和华语朗诵大会上获得优胜的孩子们也是新移民的孩子们^①。另外，伴随着新移民进入新加坡的，还有中国的南北风味菜肴，丰富着当地的饮食文化。面对中国新移民多方面的作为和影响，当地媒体纷纷开设专版，报道新移民在新加坡的生活、工作、学习、创业情况，让更多的新加坡华人了解周围的新移民，也让新移民有相互了解和诉求的平台。如《联合早报》^②、《联合晚报》、《新明日报》都辟有专刊。而对于那些歧视中国新移民的心态和行为，则不为新加坡有识之士所认同。他们坦言，歧视中国新移民的人大致上有两类：一是无知者，小国寡民心态，对历史和现实知之甚少；另一类是对中国、中国人与中华文化有很深的成见与偏见。尽管如此，这两类人也在改变，随着中国经济对东南亚和新加坡带动的作用日趋增大，越来越多的新加坡华人开始认识到中国对新加坡的重要意义^③。由此，又形成了第三类比较实用的华人。他们认为，为了和中国做生意，需要学习那些可以利用到的中华文化知识，以便透过贸易联络网进军中国市场或在中国设立公司，但他不需要爱中国或爱中国人。的确，经贸活动会在利益驱动下展开，但随之而来的一种有关中国和中国人的认知也会在经贸互动中逐渐成形。民间交往及其相互影响的过程、内容和结构，由此而折射、拓展。

值得指出的是，在面对偏见和歧视的同时，一些新移民也在自省：如何以积极的态度投身到新加坡赶搭中国经济顺风车的洪流中，配合本地公司去中国经商和投资的实践，把自己的作用和价值发挥出来^④。更有一些新移民发现自己在新加坡工作和生活的日子里，交了很多受英文教育而品格高尚、有爱心的新加坡朋友。日子愈久，他们对新加坡的感情愈深。并且相信自己也会在工作中，以人格和实力赢得同僚的尊重^⑤。

显然，无论是新加坡的华人社会，还是中国的新移民，彼此之间都在调整自我和对方的关系与看法，并进一步相互适应、容纳、接受和欣赏。许多人注意到，新加坡华人对中国新移民的态度，正在由最初的心存傲慢与偏见，逐渐转向接受与欣赏。这样，经过初期略带不快和不适的接近与接触之后，新移民和当地华人社会的理解与了解在加深，双方正在各自基础上作出更符合事实的认知与判断。

三、新移民社会网络的建构和扩展

跨国的社会实践，必然涉及跨国社会网络的建构。有关社会网络分析 (social network analysis)，在社会科学界已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指标体系和概念方法^⑥。但本文的旨趣不在于具体指标的测量与运用，而是以此为视角说明，通过网络，相关或共同利益的人们，彼此连接，共享信息，互为认同，实现互助。也就是说，通过网络功效，人们在正确的时间、地点找到正确的人和正确的信息，从而获得更多有利于个人和群体发展的社会资本。社会网络因此被解释为由人与信息的互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所组成的结构^⑦。中国新移民如何在新加坡运用社会网络功效，实现个人和群体对于当地社会和外部社会的努力与成就，于此可见。

1. 新移民社会网络构造，有利于内部族群团结与外部社会和谐。网络的构造源于相互信任、

① [日] 小木裕文：《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厦门大学《南洋资料译丛》，2003年第1期，第22-28页。

② 2003年10月29日，《联合早报》推出《新天地》专刊报道中国新移民。对此，旅居当地的新移民认为，此举既有助于新移民融入当地，也有助于新加坡人了解中国新移民，是一大进步。

③ 《新加坡人看中国新移民》，广东侨网讯2004年6月14日。

④ 杨建伟《新移民的作用与价值——读李光耀国大“资政论坛”讲演有感》，[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10月24日。

⑤ 汪振帆：《中国人对新加坡华人的看法》，[新加坡]《联合早报》。

⑥ 参见罗家德、赵延东《社会资本的层次及其测量方法》，李培林主编《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106-107页。

⑦ “Social Networks: Connecting People with information and each other.” July 2002, <http://www.verity.com>.

公共参与和社会连结。一个组织或社会中，信任度越高，成员参与公共活动比率越高，网络联系越加紧密，则该社会（集体）的社会资本累积度也就越高^①。新加坡中国新移民社会网络的构造，源于这种基础。2001年5月7日，由20世纪80年代移居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筹组的“华源会”成立。它标志着新移民试图透过社会网络的构建，致力于族群内部的团结与发展，并与当地的外部社会取得和谐，打造出新移民的积极形象。华源会，取意“饮水思源，时刻铭记中国是自己的根”。迄今，会员已有1500多位，荟萃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新移民精英。他们各擅其长，组成了商业贸易组（企业家俱乐部）、文化组（艺术团）、教育组、会员发展组、社会服务组、活动策划组、公关组、科技信息组与体育组。其宗旨为协助中国新移民更好地融入本地多元种族社会、促进会员间信息交流与沟通同时，为新、中两国搭起文化、科技和商贸交流的桥梁^②。华源会成立后，表现突出：艺术团先后到新加坡的学校社区举行演出，到马来西亚吉隆坡、马六甲献演；为新加坡同济医院义演筹集科研经费；主办全国华族文化节晚会节目；企业家俱乐部则负责接待来自中国各省市的招商团，组团回家乡参加各种贸易洽谈会、博览会；华源会还率领会员们积极参与政府鼓励国人说标准华语的努力，在假期为学生们举办各种活动，并与《联合早报》联办第四届全国华语演讲比赛，邀请中国艺术家赴新加坡表演^③。在此同时，它亦积极承担起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如2003年10月，新加坡人力部停止签发工作准证给资历不足的陪读妈妈^④后，一些在找工作或换工作的陪读妈妈陷入了经济困境。为此，华源会与一家管理公司合作，竭力帮助解决陪读妈妈就业和照顾孩子的问题^⑤。华源会的努力显示，通过新移民个人、群体与当地社会、政府的有效互动和双向影响，新移民与当地社会的结构状貌已呈现出活力有序的格局：通过调动各种民间资源，发挥社会网络的价值功效，服务社会，造福人群。因此，短短6年里，华源会不仅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更获得政府的积极肯定。中国新移民和当地社会的融合在逐步走向深入。

2. 新移民社会网络构造，有利于跨国经济互动和新文化的建构。新移民或跨国华人互动领域的一个主要特征表现为“非地域性”，即和传统移民不同，民族国家的地域、政治意义在新移民那里不再重要，相反，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空间具有更多意蕴^⑥。这种跨国互动显示，新移民群体的兴起正在重建多个不同领域的互动关系，从而为新的国家叙述和族群阐释拓展多种可能性。以移民跨国网络构造来看，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令华人新移民的角色作用愈益醒目，特别在两国经贸发展和文化交流过程中，有双边社会文化背景的新移民具有格外优势。2001年，时任新加坡贸工部部长的杨荣文表示，他率领访问中国西部的57人考察团中，有4位是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杨荣文说：“他们已经是新加坡人，孩子在新加坡长大，他们和我们一起工作，认同新加坡。不过，当他们回到自己的省份时，还是流露出自在的感觉。当我把他们介绍给当地官员时，他们就像回到家一样。”“这意味着，中国人才移民到新加坡，已经为我们制造了一个很有价值的经济联络网，我们应该善用它。”^⑦对此，新加坡政府充满期待。外来人才不仅是新加坡重要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的一部分，更是国家间经贸关系互动的重要实践者和促进者之一。

同样，中国政府对于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也有期许。2004年在华源会三周年庆贺筹款晚宴

① 罗家德、赵延东：《社会资本的层次及其测量方法》，李培林主编《社会学：理论与经验》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120页。

② 曾平：《新加坡华源会会长王泉成》，<http://www.chinatoday.com.cn>，今日中国2005年5月10日。

③ 《致力华族融入侨居地——访新加坡华源会会长王泉成》，中新社2002年9月2日。

④ “陪读妈妈”，指的是中国母亲陪伴17岁以下小孩到新加坡报读正规中、小学校。陪读母亲可以申请工作。目前，新加坡已有1万多名中国陪读妈妈，构成当地社会一个特殊群体，但其中的一部分人生活艰辛。

⑤ 《新加坡华源会住宿计划为陪读妈妈找出路》，北京《华声报》2003年10月28日。

⑥ 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223页。

⑦ 《中国新移民为新加坡架起联络网》，[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8月30日。

上,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张云表示,华源会成立以来在帮助会员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增进中、新两国间的友谊、为促进两国在教育、科技、经贸等方面的合作作出了贡献^①。民间关系互动有助于国家关系发展,而新移民的跨国活动正在成为促进国家关系发展的新的实践领域和努力方向。当然,移民的跨国活动并非新现象。诚如有学者指出,人们对于它的新奇之处在于其组织程度:基于共同关涉和共同利益而构建起来的网络和结构完整的社群组织^②。正是这类跨国社群组织在调用社会资本,建构居住国和祖(籍)国双方的社会空间时,不断运用和扩大联系彼此的社会网络,从而在地区关系格局中把国家联系了起来。跨国华人及其组织,由于共同关涉和共同利益的一致与相似,令他们发展出多重关怀与双边互动,进而在居住国和祖(籍)国之间实现经济互补与文化创新。以“华源会”会长王泉成来说,在努力帮助新移民融入居住国同时,他更积极投资中国,创办实业,扩大事业基础。而对故乡泉州,他则捐资建景点、办商场、兴酒店;修建学校、创立基金会、兴办幼儿园;甚至建造桥梁、铺筑水泥路、修建祖祠^③。这种成功不忘反馈乡里、造福人群的善举,既是传统华人的基本特性和根本抱负,也是新一代跨国华人的身份自觉——他们更倾向于在民族国家之间构建连接彼此的跨国活动空间,在两个或多个舞台上展示华人新移民的价值理念和能力贡献。王泉成的一个最大心愿:“就是要改变世界对新一代华人的印象!”^④这番雄心与智慧,表达的是全球化时代跨国移民对于民族、国家的责任,也是经济成就之后的文化感悟。

移民的社会网络,作为一种移民个人和群体的社会资本,不仅表现在移民产生的原因以及延续的机制等方面,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人际结构,网络介于个人决策的微观层面与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之间。通过网络,可以了解全球化时代移民的社会特征及其存在结构^⑤——把个人、社团、国家乃至地区连接起来。如今,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在不同领域,为当地社会作出贡献。他们中许多人、经常返回中国探亲、经商和工作,不断建构和扩大有益于两国民间往来的关系网络,成为新、中之间跨国社会空间的主要行为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经过新加坡洗礼之后,实现了新的重组。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把新加坡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带回中国的同时,也把中国经济、文化的最新发展与进步信息传回新加坡。

2005 年始,新加坡政府为招揽中国人才,将其全球揽才机构“联系新加坡”开进了上海,并抛出了高薪和居留权两大“橄榄枝”,以吸引熟练的专业工人和技师。同时,新加坡放宽投资移民转入资金投资条件,资金到位后 3 个月,全家及主申请人的父母可获得新加坡永久居民,无学历、语言及居住要求^⑥。此一政策出台说明,中国新移民的杰出表现已经为两地的持续互动拓宽了更广泛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交流和互动的社会功用正在显示其推动国家政策相应提供的积极机制方面,从而为进一步扩大两国民间交往,实现跨国社会网络的架构,提供了经济互补、文化共享的地区发展模式。有必要注意的是,在中国人不断“南来”新加坡的同时,也有一些新加坡华人选择“北上”到中国工作、求学、经商或定居^⑦。在 2000—2004 年底的 5 年间,到上海发展的新加坡人,已从 1000 人增加到 5000 人^⑧。这种双向流动进程,预示着民间关系良性状态的起步。而中国新移民则为这种跨国的社会网络建构和扩展,提供了努力和实践的方向。

① 《张云大使出席新加坡华源会成立三周年筹款晚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2005 年 10 月 15 日。

② 里瓦·卡斯托里亚诺:《移居、跨国社群和公民身份》,北京《国际社会科学》2001 年第 3 期。

③ 陈添地:《新加坡华源会侨领王泉成:婆家娘家兼爱两顾》,《福建侨报》2003 年 9 月 23 日。

④ 曾平:《新加坡华源会会长王泉成》,http://www.chinatoday.com.cn. 今日中国 2005 年 5 月 10 日。

⑤ [西班牙] 华金·阿朗戈:《移民研究的评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1 年第 3 期,转引自《新华文摘》2001 年第 12 期。

⑥ 《新加坡华人在国家情感与全球化趋势下获取平衡》,《瞭望东方周刊》2005 年 05 月 11 日。

⑦ 张从兴:《新中语言南来北上》,《新加坡》《联合早报》2005 年 10 月 1 日。

⑧ 新加坡国立大学网 http://www.nus.edu.sg. 2006 年 2 月 5 日。

四、结 语

透过中国新移民和新加坡华人的社会互动,可以看到民间关系在由弱^①向强^②的转化过程中,双方的适应、调整和反应已进入了新阶段。如今,中新民间关系的意义已不仅仅是过去一个多世纪历史血脉的简单延续,而是成为了推进地区关系发展,改善和改变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发展的示范。新加坡自 1965 年以来,已走过了李光耀时代(1965—1990 年)、吴作栋时代(1991—2005 年),进入李显龙时代(2005 年 8 月任总理)。在短暂的建国过程中,新加坡华人形成了自身的民族国家意识,不再和中国认同。对此,无论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还是两岸三地的中国人,都有清醒认识,并发展出了和新加坡华人共存互动的积极模式:在国家关系前提下构筑民间关系,在民间关系基础上推进国家关系。也因此,尽管两国关系仍受制于现实的、地理的、政策的和心理的疏离和隔膜,但无疑,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人们有理由期待中新民间关系会在既有基础上持续深入发展,从而为两国的国家利益提供可以获取的民间资源。

本项研究显示,国家关系的建立,为民间关系打开了交流和交往的正式而广泛的渠道;尽管国家关系的建立和互动不依赖于民间关系,但民间关系可以在不同层面推进国家关系;民间关系的顺利发展,有赖于国家实力结构的相对平衡和相互依赖的内在需要;至于民间关系的友好深入,则取决于跨国移民的经济成就、文化努力和社会贡献。只有当跨国移民群体在沟通居住国和祖(籍)国之间积极有为的时候,才能够为国家关系的持久深入发展奠定厚实的民意基础。当然,目前除了少数的跨国移民个人具有突出成就之外,庞大的跨国移民群体还远没有达到足以在各个领域形成广泛影响的程度。也正因此,透过民间关系互动,把握跨国移民对于民族国家的社会功用,仍然是一个有待探讨的话题。

(责任编辑:李 申)

Civil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Singapore Since 1990

——A Case Study on Social Interaction among Chinese New Immigrants and Local Ethnic Chinese Society

Wu Qianjin

Abstract: Since China and Singapore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in 1990,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wo countrie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frequent. More important, approximately 300,000 Chinese new immigrants have provided a favorable basis for civil interaction. From a perspective of social interaction between Chinese new immigration and local ethnic Chinese society,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plain that state's relationship and civil relationship are interdependent, and civil relations will ultimately promote the state's relations through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weak to the strong ones. It argues that the civil exchanges between two countries will inevitably experience a process of "grinding-in" before achieving the integration and harmony. Thus, the role of Chinese new immigrants in civil relationship and state's relationship should not be underestimated.

Key Words: Chinese New Immigrants; Singapore's Ethnic Chinese Society; Social Interaction; Civil Relationship

- ① 弱的含义包括两方面:一指双方关系刚刚起步,没有深厚的情谊基础;二指双方关系起步初期,彼此的负面评价远大于正面评价。
- ② 强的含义也有两方面:一是指双方关系经过接触和了解的阶段,彼此间已具有适当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评价;二是指随着双方关系互动和适应的加强与深入,必将推动经济、社会和文化交往的普遍化,民间关系推进国家关系发展的局面也就到来。